

評介梶山雅史編 《近代日本教育會史研究》

謝明如*

書名：《近代日本教育會史研究》

作者：梶山雅史

出版時地：東京：學術出版會，2007

頁數：417頁

一

本書係東北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研究科發起成立之「教育會の総合的研究會」共同研究成果的第一回論文集，亦是第一本以教育會史為主題之學術性專書。編者梶山雅史，1943年生於兵庫縣，1988年以〈近代日本教科書史研究—明治期檢定制度の成立と崩壊〉取得京都大學教育學博士，其後，歷任岐阜大學教育學部助教授、教授、東北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研究科教授等職，現任岐阜女子大學文化創造學部初等教育學課程教授。其長期關注戰前教科書史、地方教育史及教員養成等課題，著有《近代日本教科書史研究》、《岐阜縣教育史》等專書9種（含合著）、〈地方教育會の歷史的研究—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明治 10 年代岐阜県における地方教育会規約〉等論文和研究成果報告 33 篇。2002 年起先後以〈近代日本教育情報回路形成的歴史性研究（1）—作為情報回路的地方教育會〉、〈近代日本作為教育情報回路的中央、地方教育會之綜合性研究〉研究計畫，兩度獲得日本學術振興會三年的研究補助，乃以此為契機，於 2004 年 7 月發起「教育会の総合的研究会」，以隔月舉行例會的方式，開啟集體研究教育會史之端緒。影響所及，東北大學教育學研究科幾可謂為教育會史研究之重鎮。2007 年 7 月，該會成立滿三年之際，適逢梶山屆齡退休，乃「將迄今的研究報告整理成書」，故本書一方面是前述研究補助計畫的部分成果，亦是該會初步研究成果之集成。

二

本書除序章外，分為 12 章，由單篇論文依時序、主題編纂而成。梶山氏於序章「從事教育會史研究的邀約」中，首先概述戰前教育會之歷史，並提示新的研究取徑。指出 1872 年學制發布後，各地紛紛成立「學區取締會議」、「學事會議」等教育組織，以因應新教育事業的各種問題，為教育會之前身。隨著自由民權運動高漲，自 1881 年起，文部省開始加強對地方教員組織之監督，促使全國府縣、郡區町村等各層級之教育會漸次開展。日俄戰爭後，教育會的「翼贊」性格增強，組織呈現分化和統合並行發展之現象。¹1944 年全國各種教育團體整編為「大日本教育會」，惟戰後未幾即改組、解散。在研究視角方面，包括：（1）解明教育會「情報回路」之機制及其流通內容；（2）探討地方教育會的主體性；（3）依行政制度之變遷，分期探討地方教育會組織及其機能之調整；（4）教育會「教員養成」事業在近代教育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對教員社會

¹ 作者指出，此時作為職能團體的「小學校長會」、「教員會」等從教育會中分出；1910 年代，隨著新教育思潮的流入、教員待遇問題的產生，各縣結成新教員會、女教員會的動向頗為顯著。另一方面，帝國教育會在會長沢柳政太郎的領導下，與各府縣、都市教育會等 85 個團體聯合並召開「帝國連合教育會」，顯示教育團體分化與統合的趨勢並存。

的影響等。以下 12 章即可說是實踐上述視角之案例。

第一章千葉昌弘²著〈自由民權運動之展開與教育會源流小考〉，透過宮城、岩手兩縣學事會議開設之過程，探討 1877 年前後自由民權運動與教育會之關聯性。指出參與各種學事、教育會議之成員，有不少亦參與自由民權運動社團，顯示初期教育會組織未必是官權的「翼贊機構」，然而，當民權運動逐漸退潮，文部省強化對教育會之統制，教育會擁有的自治、自律性格亦逐漸喪失。

第二章田島昇³著〈福島縣教育會議之終結—「福島縣私立教育會」創立前史〉，同樣探討東北地方府縣教育會議創設初期之情形。指出 1879 年福島縣教育會成立以前，縣內各郡、區的教育會議發揮教育行政之機能，有助於初等教育之普及與定著。然而，自 1882 年起文部省加強對教育會之管理，與民權派激烈對立的三島通庸復擔任縣令，郡教育會遂逐漸變成郡或學校組合的事務聯絡會議，而縣當局則進一步以「教育諮詢會」代替原擬成立之「公立教育會」，在此一情形下，有志教員乃於 1885 年 9 月成立「福島縣私立教育會」，期待以此作為相互交流與實踐教育理想之場域。

第三章谷雅泰⁴著〈森有禮的「自理精神」與福島縣的容受—從福島縣私立教育會之成立到規則改正〉，接續前章的時序脈絡，進一步探討福島縣私立教育會成立之初的發展，以及規則修訂之背

² 千葉昌弘，1941年生，1973年東北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了，歷任仙台大學體育學部講師、高知大學教育學部助教授、教授、岩手大學教育學部教授等職，現任北里大學獸醫學部教職課程教授。其專攻明治時期東北地方教育史、自由民權期教育思想之演變、教員及其養成機關研究等課題，著有《土佐の自由民權運動と教育》、《近代日本地域民衆教育成立過程の研究：近代学校の成立と自由民權運動の展開》等專書5種（含合著），〈自由民權運動の教育史的意義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宮城県の場合を事例として〉等論文42篇。

³ 田島昇，前桑折町史編纂室室長，著有〈地方史誌編纂と史料の利用—「桑折町史」編纂の経験を通じて〉等論文6篇。

⁴ 谷雅泰，1962年生，東京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了，在學期間專攻教育行政學，研究課題主要關注學校制度史、明治初期地方社會對新教育之回應，教育與社會之關係等，曾發表〈日本近代教育法制史概説〉、〈教育令（明治12年）期の学務委員制度に関する研究〉等論文18篇，以及〈市制町村制期における行政村の就学勸奨及び小学校運営に関する実証的研究〉文部省科學研究費補助成果報告1種。

景。指出 1885 年福島私立教育會創立時即與縣當局有密切關聯，由縣知事擔任總理，學務課長擔任會長。然而，學務課長能勢榮積極從其他府縣招聘教育家的作法引發該會反彈，雙方關係緊張。待 1888 年文部大臣森有禮來縣訪視，提出將校長選任等權責委諸各府郡教育會的「自理精神」理念，該會乃善加利用，於翌年 7 月修訂規則，採代議制，確立與地方部會的上下關係，因而從「協議會式」的組織轉變為具一定權限之組織。

第四章清水禎文⁵著〈明治期群馬縣教育會之展開〉，旨在檢視 1886 年上野教育會成立以降迄明治末年群馬縣內教育會發展之動向，乃係承接作者〈群馬県における教育会の歴史的研究—私立上野教育会成立まで〉⁶一文之後續研究。指出 1893 年「箝口訓令」及 1895 年市町村學事會規程之頒布，使教育會、教員會逐漸被置於行政控制之下。上野教育會成員以小學校長及師範畢業生為主，且未與市郡教育會建立關係，基礎本頗為脆弱，待 1900 年代由縣主導的教育行政體制架構（縣〔縣視學官〕—郡〔郡視學〕—小學校長會）確立，⁷其活動領域愈加縮小，機能更為窄化，以致無法維繫創立之初兼行「議事」、「教育談」之構想，而漸以雜誌發行為重心。

第五章笠間賢二⁸著〈宮城縣教育會之教員培育事業〉及第六

⁵ 清水禎文，1991 年東北大學教育學博士課程修了，現任東北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研究科教育設計評價課程助教，研究課題最初以近代德國的教育與政治為主，2004 年起投入地方教育會史研究，曾發表〈明治期の群馬県における教育会の歴史的研究〉、〈群馬県における教育会の歴史的研究—私立上野教育会成立まで〉等論文 21 篇，以及〈ドイツ精神科学における「自由」と政治：戦間期・ナチズム・戦後〉等文部省科學研究費補助成果報告 3 種。

⁶ 請參閱清水禎文，〈群馬県における教育会の歴史的研究—私立上野教育会成立まで〉，《東北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研究年報》，53：1（仙台，2004.10），頁 23-42。

⁷ 意指縣當局透過縣視學官舉辦之郡視學會議，以及郡長召集之小學校長會議宣達政令，確保政策之落實。

⁸ 笠間賢二，2003 年以〈地方改良運動期における小学校の変容〉取得東北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現任宮城教育大學教育學部教授，研究課題以教育與地域社會之關係、教員培育等為主，著有專書《地方改良運動期における小学校と地域社会：「教化ノ中心」としての小学校》、文部省科學研究費補助成果報告〈「小学校教育効績者選奨」（1905-1924）の調査研究〉各 1 種，以及〈小学校教員無試験検定に関する研究—宮城県を事例として〉、〈明治末期からの公教育運営の変容〉等論文 12 篇。

章大迫章史⁹著〈廣島縣私立教育會之教員培育事業〉，分別以宮城、廣島兩縣教育會的教員培育事業為例，解明教育會在師資培育上所扮演的角色。二文皆指出當局透過縣教育會舉辦講習、課程結束後舉行臨時試驗檢定的配套措施，相當程度地解決明治、大正時期師資不足之問題，成為師範學校外主要的師資培育途徑。從講習到試驗的過程中，則一貫由師範學校教師擔任講師、出題及評分者。不同的是，宮城縣教育會與郡教育會分別培育尋常小學校本科正教員和尋常小學校准教員；廣島縣私立教育會講習部則配合師範學校組織之更迭及其需求，數度變更培育對象及資格，兩者角色分工的對象顯然有所差異。

第七章山田惠吾¹⁰著〈教員統制與地方教育會—以1920年代後期至30年代前期的千葉縣教育會為例〉，旨在探討1925-1935年間千葉縣學務當局逐步控制縣教育會之過程。指出1925年以前千葉縣教育會作為教員解決自身課題之集團，保有教育專家之「自負」，並非學務當局的「御用團體」，然而，1926年地方官官制改正後，縣當局欲儘速強化其統制力，乃在與「自由教育派」對立之情形下積極介入翌年縣教育會的主事選舉，進而更改選舉方式，設置特選主事和各郡代表主事，造成教育會政黨化、官僚化，以及會員內部「官選派」、「民選派」激烈的對立，迄1932年千葉縣主事大久保留次郎排除縣教育會的政黨勢力，縣學務當局的意向始得透過教育會向教員社會直接傳達。

⁹ 大迫章史，2004年東北大學教育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了，現任仙台白百合女子大學人間發達學科（人類發展學系）助教。研究課題以近代日本私立高等教育機關為主，著有〈宮城におけるキリスト教女子教育—宮城女学校と高等女学校の関係を中心に〉等論文4篇。

¹⁰ 山田惠吾，1968年生，現任茨城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研究科准教授。其長期以地方教育史為中心，關注昭和初期以前千葉縣自由教育與鄉土教育等議題，2007年以〈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教員統制に関する研究：千葉県学務当局の教育施策の展開過程からみた〉取得筑波大學博士學位，著有《学校教育とカリキュラム》等專書3種（合著）及〈昭和初期千葉における郷土教育の展開—県当局の「教育の郷土化」施策を中心に〉、〈1926年地方官官制改正と「自由教育」への統制—千葉県学務当局の役割の分析を中心に〉等論文近10篇。

第八章板橋孝幸、¹¹佐藤高樹¹²合著〈農村小學校的學校經營與村教育會—以宮城縣名取郡中田村為例〉，旨在考察大正末年至昭和戰前期村教育會機能之變遷及其與學校經營、鄉土教育之關係。指出 1926 年中田村教育會成立後，透過舉辦「通俗講演會」、支援農業補習學校等教育機構、刊行機關誌等方式，以小學校為據點，積極推動社會教育和鄉土教育。進入戰爭時期後，社會教育事業轉由愛國會、社會教育委員會、主婦會等新教化團體負責，故該會不僅未如其他研究所述成為「社會教育中樞機關」，其事業領域反而大為縮小。

第九章須田將司¹³著〈恐慌至戰時地方教育會動向之考察—以學務部、郡教育會、兒童常會為中心〉，旨在解明 1930 年代福島縣學務部、縣教育會及其部會與「報德運動」之關係。指出福島縣學務部長身兼教化團體聯合會會長，故不僅迅速接受中央教化團體聯合會所提倡之「常會」構想，派遣社會教育主事及縣視學參與長期講習會，還將「福島縣報德振興會」事務局設於學務部內，並在《福島縣教育》雜誌中頻繁地刊載報德活動相關消息，引導縣內報德運動之發展。而地域性深厚的縣教育會相馬部會亦呼應學務部「報德化」之動向，積極舉辦報德講習、發動二宮尊德銅像建設運動、從事報德研究等，充分發揮其組織力。

第十章白石崇人¹⁴著〈文部省對大日本教育會及帝國教育會之

¹¹ 板橋孝幸，1975年生於埼玉縣，東北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了，現任福島大學綜合教育研究中心准教授、日本大學講師，研究課題主要為戰前期農村的鄉土教育，著有專書《勤勞青少年教育の終焉—学校教育と社会教育の狭間で》(合著)，以及〈昭和戰前期農村小學校における郷土教育実践の変容—「科学的」調査から自力更生の実践への転換〉等論文6篇。

¹² 佐藤高樹，東北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研究科博士課程研究生，曾發表〈宮城県におけるドルトン・プランの紹介とその反響—宮城県教育会雑誌『宮城教育』を手がかりに〉等論文3篇。

¹³ 須田將司，1977年生於福島縣，2004年以〈昭和前期地域教育の再編と教員〉取得東北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研究科博士學位，現任仙台市立八木山小學校教諭。著有專書《昭和前期地域教育の再編と教員：「常会」の形成と展開》及〈大日本報徳社の長期講習会における常会指導者養成—教員受講者に焦点を当てて〉、〈佐々井信太郎の常会構想—1930年代における国民教化方策の提唱〉等論文8篇。

¹⁴ 白石崇人，1979年出生於愛媛縣，2008年3月廣島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研究科博士課程

諮詢〉，旨在分析文部省對大日本教育會及其後身團體帝國教育會¹⁵諮詢之情況和內容，以究明該會在中央教育行政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向來關於該會之研究多執著於「翼贊團體」或「壓力團體」之評價，實則從該會對諮詢問題之回應顯示，其雖然尊重文部省的意向，但亦兼採與之相異的輿論，顯示具相當程度的主體性，另一方面，文部省在長期缺乏初等教育諮詢機關之情形下，亦期待該會就初等教育議題提出專業性的見解，俾藉由「諮問—答申」之管道，發揮「文部省向教育者傳達政策意圖，教育者向文部省提供地方情報」的雙向交流作用。

然而，究竟文部省提出諮問的背景、意圖為何？該會的審議及答申狀況又如何？第十一章千田榮美¹⁶著〈1909年文部省的全國連合教育會諮問—日俄戰爭後天皇制教育之一剖面〉，提供個案探討的範例。該文指出日俄戰爭後，文部省在面對教育敕語權威動搖問題日益深刻、擴大的情勢下，為貫徹敕語旨趣，乃先後向「師範學校長會議」、帝國教育會主辦之「全國連合教育會」提出諮詢，其目的除獲得具體的建議外，亦希藉此向教育者確認教育敕語作為天皇制教育理念的重要性，喚起其貫徹敕語旨趣的主體意識。進一步比較兩會所提「答申」之內容，顯示全國連合教育會提出不少獨特的技術性建議，且其中有數項作法（例如規定中學生需默誦默寫敕語、將敕語全文置於修身教科書卷首等）於日後獲得文部省採用而正式實施。

第十二章陳虹彬¹⁷著〈日本殖民地統治下關於臺灣教育會的歷史性研究〉，乃是本書唯一探討殖民地教育會之論文。該文旨在透

修了，現任廣島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研究科教育學講座助教。其自碩士階段即著力於大日本教育會之研究，著有〈大日本教育會における研究活動の展開〉（碩士論文）、〈明治二十年前後における大日本教育会の討議会に関する研究〉等論文14篇。

¹⁵ 1896年大日本教育會與國家教育社合併後，易名為「帝國教育會」。

¹⁶ 千田榮美，東北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研究生，曾發表〈戊申詔書の發布とその反響〉、〈三教会同と天皇制教育〉（合著）等論文3篇。

¹⁷ 陳虹彬，2007年以〈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国語科の成立と国語教科書編纂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台湾総督府編修官加藤春城を中心に〉取得日本東北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曾發表〈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国語」という教科の成立と伊沢修二〉、〈日本中高一貫教育制度之實施與問題探討〉等中、日文論文6篇。

過臺灣教育會之組織、活動、營運體制及經費來源等面向，剖析臺灣教育會在殖民支配下的角色和作用。指出臺灣教育會自創立起即為臺灣總督府所育成，用以實踐教育政策之團體。總督府藉由控制人事與經費，對臺灣教育會握有絕對的主導權，其「上下支配的關係相當明顯」（頁 402）。

三

在歷史學界普遍重視地域史、社會史的趨勢中，近 15 年來關於日本戰前教育會之研究，無論質或量均有顯著的提升。¹⁸ 研究會之結成與本書之刊行，一方面既是近年來蓬勃發展的教育會史研究潮流之一環，另一方面亦是研究者不滿足於現有成果所作的努力。作為首部教育會史研究之專書，本書在章節編排、資料運用、研究視角及論點闡釋等方面，皆有值得稱許之處。

首先，就章節架構而言，編者於序章中概述戰前教育會史，其後則依時序、地域、主題將雜然紛陳的課題有系統地連綴編排成章節，因而不僅有效降低論文集欠缺整體性、連貫性的先天缺陷，亦在協助讀者掌握日本戰前教育會史的基礎知識之餘，提示多樣的研究新視角和地域比較研究之平台，發揮論文集之所長。

其次，就資料運用而論，以地方教育會為主題之論文均確實掌握地方教育會出版之會史、機關誌、議事錄、統計書、文部省年報等基本史料，其中部分論文更進一步利用時人回憶文字、日記，甚至挖掘地方縣史館、小學校或私人典藏之公私文書，補充既有史料之不足。舉例而言，千葉氏運用保存於仙台市上杉山通小學校之「教育議會誌」探析明治 10 年代「教育議會」變更為「教育會」之經緯；須田氏利用藏於佐藤弘毅宅邸之文書觀察福島縣相馬報德振興

¹⁸ 依據渡部宗助、梶山雅史先後收集之目錄，就數量觀之，迄 1990 年教育會史相關研究僅 25 種，至 2005 年則激增為 155 種。就研究課題觀之，1990 年以前多限於概述性文字，或僅探討明治 10-20 年代地方教育會成立之過程；近年來則擴及至組織、營運、事業、機關誌等各項議題。不可否認，兩者選擇標準或有不同，惟亦可看出大致趨勢。參見渡部宗助，《府県教育會に關する歴史的研究》（東京：文部省科學研究費研究成果報告書，1991）；梶山雅史、竹田進吾，〈教育會研究文獻目錄（1）〉，《東北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研究年報》，53：2（仙台，2005.3），頁 301-327。

會活動之概況；佐藤氏透過藏於仙台中田小學校之教案探討鄉土教育實踐之情形，均有所獲。至於以全國性的大日本教育會為對象之研究，除掌握該會的機關誌外，另廣泛爬梳《教育公報》、《教育時論》、《教育報知》、《教育界》、《教育研究》、《日本之小學教師》等同時期的報章雜誌，有助於更周全地掌握該會之動向，以及瞭解時人對該會之評價。

其三，就研究視角觀之，本書至少在下列三個面向呼應梶山氏所提示的新研究取徑：(1) 重視地方教育會的主體性及地域特色：以本書所佔篇數最多的東北地方相關研究為例，第一至三、八、九等章分別探討 1880-1930 年代福島、宮城等縣町村教育會之動向，指出 1880 年代初期以前教育會作為職能團體，有別於行政當局立場之獨立性；而昭和時期教育會呼應當局從事社會、鄉土教育、報德運動等之種種作為，實有賴地域社會獨特的歷史傳統和教育背景之支持。(2) 論證地方行政區劃對教育會組織及其機能之影響：例如 1879 年福島縣因「郡區町村編成法」之頒布而修改教育會相關規定；1883 年因實施「連合町村制」，學校組合成為郡和學校的中介機關，造成教育會有名無實化。再如 1890 年公布的府縣制、郡制，確立教育行政架構，縮小群馬縣教育會的功能等，在在證實探討教育會之沿革不宜忽略地方行政制度之變遷。(3) 突顯教育會「教員養成」事業比較研究的重要性：關於教育會「教員養成」事業之課題，梶山氏已啟其端緒，提示研究之取徑，¹⁹而本書所收錄笠間、大迫兩氏之論文則更清楚顯示，即使同樣是教育會的教員養成事業，因地方當局之政策、教師配置情形、教育會組織、師範學校師資培育計畫等之差異，執行情形亦有所不同，故有必要從地域史的角度作更細緻而深入的探討。

¹⁹ 梶山雅史著〈京都府教育會の教員養成事業〉，收錄於本山幸彦編著，《京都府會と教育政策》（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0），乃是首篇以地方教育會「教員養成」事業為課題之論著，其後同氏持續發表〈變則の小學校教員養成ルート—教育會の教員養成事業〉（日本教育史研究會會議資料）、〈もう一つの教育養成システム—地方教育會教員講習會が投げかけるもの〉，收錄於日本教育史研究會編，《日本教育史往來》，146（水戸，2003.10），提示研究此一課題之方向。

其四，論點方面，筆者以為本書最大特色之一，在於跳脫「翼贊/壓力」團體的二元論架構。自 1967 年石戶谷哲夫為文批判木戶若雄「公、私立教育會對立」之觀點，進而指出私立教育會的「官制性格」以來，教育會的性質為何，始終是研究者所關注的核心焦點。²⁰對於此一問題，本書提出明確的見解。指出進入 1930 年代戰爭期以前，行政當局確實透過發布訓令、變更教育行政制度、控制經費和人事等手段逐漸掌控地方教育會，惟教育會亦藉由發表反對言論、重組、幹部選舉、與郡市町村教育會建立關係等方式折衝因應，其過程並非直線、單向式的發展。另一方面，即使是教育會中與文部省關係最為密切的大日本教育會，其意見亦未必遵循文部省之意向。要之，本書不急於為教育會的本質作分類或定義，而正視教育會發展、演變之脈絡，以及其作為專業職能團體所能發揮的空間與所受之限制，此一作法頗值得參酌與肯定。

然而，儘管有上述諸多貢獻，筆者以為本書在架構和內容上，仍有些許缺憾或待商榷之處。首先，架構方面，本書作者群以東北大學教育學研究科成員為主，所收錄之論文在地域上顯然偏重日本國內東北地方，²¹又，殖民地部分僅論及臺灣，對於朝鮮、滿洲、樺太、南洋群島的教育會則無一觸及。相較於本書涵蓋 1870 年代至 1930 年代的時間跨度，在空間的涵蓋性上顯得較為狹隘。

其次，內容方面，書中論文所探討之課題，有部分關鍵之處尚待補強：

關於第一章所指出的宮城縣「自由民權運動」與「教育會」設立之關聯性，作者僅以「參與創立教育會者有不少係民權運動之成員」簡單帶過。事實上，早在 1967 年，石戶谷哲夫已明確指出民權運動在教育界中流行之情形，以及「各種教育集會」助長民權運動之現象。²²用是，民權運動與教育會兩者間存在關聯性並不令人

²⁰ 參見石戶谷哲夫，《日本教員史研究》（東京：講談社，1978年5刷），頁127-128。

²¹ 本書9章以日本國內地方教育會為主題的論文中，計有6章探討東北地方的福島、宮城縣，其餘3章中，兩章探討關東地區的群馬、千葉縣；1章探討廣島縣，「重北輕南」的現象極為明顯。

²² 參見石戶谷哲夫，《日本教員史研究》，頁64-74。

意外，但更重要的是，民權運動者究竟在參與創立教育會的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如何透過教育會表達其意見？對於教育會的發展又有何影響？可惜作者並未探討。

第三章作者指出福島縣教員基於對縣當局人事政策之不滿而積極呼應文部大臣森有禮主張的「自理精神」，進而修改教育會規則。在欠缺直接的史料證據下，筆者以為此一論斷似有過度簡化因果關係之嫌。由於森有禮的「教育自理」帶有部分否定官僚支配教育的「教權獨立」思想，並未受到地方與中央行政當局的支持，而地方教育會自身亦普遍如第四章所述—尚未具備足以擔當「教育自理」、行使「教育實權」的成熟的人事和組織基盤（頁 108），在此一情形下，地方當局干預福島縣私立教育會「規則改正」的可能性頗高，是否能夠直接視為教員對學務課長用人政策之反彈，令人懷疑。建議宜補充會則修訂之經過以適切說明之。

對於第十章作者檢視文部省諮詢傾向的分期方法，筆者以為有所不當。蓋其作為分期依據的「諮詢對象」²³本身即是影響議題分項統計結果的最大變數，不免令人有添足之感，加以分期的時間跨度差異太大，長則 10 年，短則 5 年，以此觀察諮詢傾向之變遷，實略顯粗疏。不如取消分期，並結合文中表一「明治大正期文部省向大日本教育會、帝國教育會及其主辦會議之諮詢年、審議機關一覽」，呈現歷年諮詢概況之變遷，一則仍可充分說明文部省諮詢之傾向；二則可呼應其後所指「會議專門化」與諮詢事項的關係；三則可釐清 1907 年以降諮詢事項究竟屬於「實務」或「抽象」的論述矛盾。²⁴

²³ 意指大日本教育會（帝國教育會）本會及其所舉辦的各項會議，包括全國連合教育會、全國小學校教育會議、全國小學校女子教育大會、農村教育協議會、全國社會教育協議會等。作者以文部省「向大日本教育會諮詢」為第一期（1888-1893）；「全無諮詢」為第二期（1894-1898）、「向帝國教育會本會及其主辦會議諮詢」為第三期（1899-1907）；「僅向全國連合教育會及全國小學校教員會議諮詢」為第四期（1908-1916）；「主辦會議多樣化」為第五期（1917-1926）。

²⁴ 作者一方面指出「文部省對兩會之諮詢，自第四期（1907年-）以降顯著可見，是關於學校教育、特別是小學校教育的學校營運、教科教授、學校訓育、教育普及之實施方法等相關內容。進一步言之，乃是欠缺小學校教員、校長的教授訓育、學校營運等豐富經驗，或關於地域教育實態的相關知識者所無法對應的、極為實際、實務

第十一章作者強調文部省向「全國聯合教育會」諮詢「貫徹敕語旨趣」之作法，具有「確認教師自省的責任意識和覺悟」、「藉由事先提供措施滲透的基礎，使其施行與普及相對圓滑化、容易化」的作用（頁 363）。從作者所附資料觀之，全國府縣郡市的公私立教育會中，僅 22 個教育會提出相關意見，故以參與全國聯合教育會者代表帝國內所有地域之教師，似有過度抬高帝國教育會的地位及其影響力之嫌。再者，此次會議除討論文部省諮詢之事項外，更重要的是審議地方教育會代表所提之議案，「貫徹敕語旨趣」一事究竟獲得多少程度的重視，是否足以喚起教員的主體意識和覺悟，甚至教育敕語權威動搖問題「深刻化、擴大化」的程度為何，均令人懷疑。至少在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中，詳細羅列地方教育會代表所提之議案，卻無隻字片語提及貫徹敕語之諮詢議題。²⁵簡言之，筆者以為作者在「如何解決敕語權威動搖」的問題意識下，過度放大全國聯合教育會的角色，以及文部省諮詢的作用及其影響力。

第十二章作者從權力觀點析論「臺灣總督府握有對臺灣教育會絕對的主導權」，兩者實為「上下支配關係」之論點，筆者以為過度簡化教育行政網絡及其運作過程之複雜性，亦抹煞了教育會自身的主體性和特殊性，難以解釋總督府何以在正式的教育行政架構外另保留臺灣教育會。

雖有上述未盡之處，本書的出版仍提供一條迅速掌握日本戰前教育會史研究趨勢之捷徑，堪稱研究該領域者必讀之著作。其不僅代表「教育會の総合的研究会」跨出成功的第一步，亦代表教育會史研究已邁入更系統化、專門化的新紀元。期待第二回論文集持續提升教育會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一方面加強檢視教育會在地域社會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響；一方面跳脫地域史視角，進行帝國

的問題。」另一方面又強調「1917年以降，帝國教育會主辦的會議多樣且專門分化……文部省的諮詢亦增加、多樣化了。但，一如『鑑於農村的現狀，教育改善事項為何』等議題，諮詢內容漸次抽象化」。究竟1907年以後諮詢議題偏向實務性或抽象性？又，若有從實務性走向抽象性之傾向，則轉變的時點為何？有待進一步說明和釐清。

²⁵ 〈全國聯合教育會終了〉，《臺灣日日新報》（臺北），第3314號，1909年5月19日，1版。

整體性的探討和比較，亦期盼本書未及納入之課題，例如教育會雜誌的書誌學式分析、殖民地教育會之發展、戰爭期間教育會之變遷、各地教育會間的交流互動和訊息傳遞等，在往後的論文集中心同樣展現令人耳目一新之成果。

